

当代人文经典书库

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ZHONGRI YUYAN WENHUA
BIJIAO YANJIU

刘齐文◎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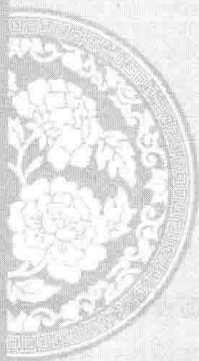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当代人文经典书库

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ZHONGRI YUYAN WENHUA
Bijiao Yanjiu

刘齐文◎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 刘齐文主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 - 7 - 5681 - 2829 - 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汉语、日语 IV. ①H1②H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938 号

□策划编辑: 王春彦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编辑: 徐小红 刘齐文

□内文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校对: 许寅逸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销售热线: 0431 - 84568122

传真: 0431 - 84568122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张: 13.5 字数: 242 千

定价: 68.00 元

作者简介

刘齐文 男，文学博士、教授，就职于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领域：中日语言文化比较，文化翻译学。在上述领域中，迄今已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并参与了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获省部级奖励1项。现任日本白帝社国际期刊《日本学研究》（ISSN1882-4056）执行主编，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贵州分会副会长。

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基金资助

编委会

编委会成员：刘金才教授（北京大学）
（排名不分先后）徐晓光教授（贵州师范大学）
张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吴光辉教授（厦门大学）
佐藤利行教授（日本国立广岛大学）
许霁教授（日本福山大学）
刘齐文教授（贵州师范大学）
王晓梅教授（贵州大学）

序 言

2007年仲秋，贵州师范大学与日本福山大学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以“2+2”办学模式展开实质性交流。同时，在贵州师范大学成立了日本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有关中日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为了充分发挥该平台的作用，为了中日学者能够互享各自的学术成果，在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齐文教授的提议下，经首都师范大学日本文化中心主任李均洋教授牵线，在日本涉谷育英会理事长小丸法之和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校长佐藤利行教授的倾力支持下，日本福山大学联合日本著名出版社白帝社，以白帝社名义在日本为日本学研究中心正式申请注册了学术期刊《日本学研究》，于2008年创刊。同时，贵州师范大学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成立《日本学研究》杂志编辑部，由外国语学院刘齐文教授任执行主编，负责征稿并组织专家审稿。审稿通过的论文经中心编辑，排版印刷后，由白帝社在日本发行。

《日本学研究》设有五个版面，分别为中日语言文化比较、文本·文学研究、日语教学实证研究、翻译研究和论考。自创刊以来，《日本学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内容涉及日本思想史、日本语教学、文学·文本研究、翻译研究、中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等。《日本学研究》杂志因学术性强，论文质量较高，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学术研究需要交流，需要争鸣，更需要资源共享。秉承此宗旨，遂萌发编辑本书的想法。

本书由四个部分构成，分别为中日语言文化比较、文本·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和论考，共23篇论文。中日语言文化比较共有8篇论文，研究范围涉及日本思想史、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考察、日俄关系、日本近世文学研究、中日神话传说、日本民俗学等内容。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援用历史考察和文本分析方法，对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观”的提出与日本“对清甲午战争”的关系、内藤“文化中心移动轮”的理论建构过程及其

主要内涵和政治指向,进行了历史性考察和基于思想史视角的分析。这样,不仅理清了该论先以“日本天职论”确立“侵华正当论”之观念,而后又通过“地势论”和“宋世近世说”一步步构建其理论逻辑的合理性之轨迹,而且阐释了该论论证“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文化中心”之理论内涵的本质,揭示了其旨在确立入侵中国的“道义正当性”和为“大东亚共荣圈”论的建构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终极指向。中日甲午战争对包括对中国文化青睐的日本汉学家们的学术走向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文化中心移动轮”之类的学说,不仅为其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奠定了意识形态舆论和理论基础,而且对部分日本人至今不能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历史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影响。厦门大学吴光辉教授则以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记行或中国古都考察或中国内陆旅行等为视角,基于西方“现代性”理论,揭示了现实中国与想象中国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差异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即“形象张力”。在这样的紧张关系下,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自中国的外部表象深入到中国社会、美术或宗教、风俗习性、文学志趣、文化性格、地域风土等诸多领域。它对日本人的“中国形象”的形成与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在日本人中建构起了有别于日本的、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这种“中国形象”的实质是日本屈服在西方的中国观之下,通过实证考察来突出、论证“中国停滞论”这一西方近代以来的话语结构的工具而已。苏民育教授以日本《近松世话净琉璃》剧本为切入点,论述了江户时代町人的“一分”意识,即体面意识的形成过程。与武士的体面意识相比,它更具有个人意识和社会性。可以说,“一分”意识的形成是日本江户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日本福山大学赵建红教授以中日制服妖怪的神话传说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与考证,揭示了中日不同的动物观和自然观。国际关系学院孙敏副教授以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氏神信仰论中的文化重层论为例,剖析了其民族文化建构中与西方思想千丝万缕的联系。浙江财经大学贾莉副教授以晚清驻日参赞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中的日本婚俗词汇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日本婚俗的程序及词汇与汉民族的异同;揭示了中日两国深厚的文化渊源关系,也是漫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侧面。深圳大学殷国梁博士以日本古学派代表人物伊藤仁斋天道观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天道”与“人道”以及“天道”与“性”的关系,阐明了在江户时代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伊藤思想天道观的特点及其进步性与局限性。海南大学高伟博

士以18—19世纪日本所谓的“对俄危机”时代（俄国势力南下后日本思想界形成的“北方认识”时代，“北方认识”包括北警论、虾夷地开发论、同化论、交战论、贸易论等）为考察对象，指出日本学者虽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但这些论述与华夷思想的关联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基于华夷思想的对立统一性，重新考察了德川时代日本知识人的北方认识，分析了俄船袭击虾夷地事件前后这种认识的变化，阐释了平田笃胤所著《千岛白浪》所反映的自他意识，明确了其在国学思想以及整个平田国学中的思想定位。

文学·文本研究的5篇论文，内容涉及日本物语文学与西方宫廷文学的对比，中日现代小说“狂人”比较，日本私小说表达方式的深度解读，当代小说的现实性意义解构，“白桦派”代表志贺直哉文学思想对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影响。北京邮电大学王雪博士以鲁迅《狂人日记》、芥川龙之介《河童》作品中的两个性格迥异的“狂人”为分析对象，从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挖掘出了两篇小说更丰富的内涵和现实意义。洛阳外国语学院魏丽华副教授以深受日本喜爱的电视剧《半泽直树》为文本，深入剖析日本式的社会现象和生存法则，有利于读者更精准地认识当代日本社会，洞悉当代日本文化。湖南师范大学杨芳副教授以两部宫廷恋爱小说《源氏物语》和《克莱芙王妃》为比较文本，从宫廷恋爱小说的特征、恋爱观的对比两方面，对比分析了日本和西欧恋爱观的差异，指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者在对日本文学作品进行解读时，容易缺失和回避道德审判这一角色。内蒙古大学周砚舒博士分析了武者小实笃小说《天真的人》中所呈现的“自我书写”这种日本私小说的叙事手法，并探讨了这种手法为私小说的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即排除了自然主义私小说“恶露”的特点，在树立自我、追求自我等方面为私小说曝出了新光。

翻译研究的5篇论文，其中4篇主要涉及中国古典作品《三国演义》的日译研究问题。另外一篇，主要探讨近年来一个比较热门的表达方式“被XX”的翻译问题。贵州师范大学刘齐文教授的系列论文主要是就中国古典作品《三国演义》的日译问题进行探讨。日本学界研究《三国演义》的成果相当丰硕，而国内学界对《三国演义》日译本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编者把自己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部分有关《三国演义》日译本的研究论文收集整理出版，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强化我国典籍作品外译策略的研究，彰显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南京农

业大学武锐副教授对“被XX”的翻译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和尝试,总结出了“零译+意译法”或“零译+背景加注法”。它们既能弘扬中国语言文化,又增加了译文的可理解性和接受性,对翻译教学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论考的5篇论文,内容涉及民族学研究、社会学实证研究、管理学、日语教学研究、日本生态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张威教授介绍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日语书面语、口语以及学习者的日语使用语料库,并就这些语料库的申请方法以及使用方法进行了说明。最后,作者利用现代日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BBCWJ)进行定量调查,考察了文脉指示词「このその」与助词「はが」的组合方式,得出了与庵功雄不同的调查结果,并针对这一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说明。贵州大学王晓梅教授梳理了晚清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展开的研究情况,指出了日本学者研究方法以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为主,调研内容广泛,记录详实丰富。可以说,这些成果既可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田野材料和研究视角,也能弥补我国晚清民初时期社会调查之不足。同时,作者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来搞活区域经济,促进地方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南京师范大学池建新副教授通过对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形成的过程进行跟踪考察,其目的在于为我国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广东财经大学李春植教授分析了广东省日语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指出日语教学要围绕提高日语运用能力为中心,必须对现存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日语教学形势的发展。

总之,本书研究范围涵盖了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作者们理论基础扎实,涉及诸多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多样,观点新颖,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在新形势下,中国日语学界对日本学研究这一课题的积极思考和探索。应该说,该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值得学界同仁参考借鉴。

刘齐文

2016年11月30日

贵阳市相宝山照壁楼简陋室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1
甲午战争与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论”的建构	刘金才 3
“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	
——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为中心	吴光辉 11
试论伊藤仁斋天道观的内涵与意义	殷国梁 22
北方危机下的自他认识与平田笃胤的《千岛白浪》	
——德川日本“北方认识”再考	高 伟 32
近松世话净琉璃剧中町人的体面意识	苏民育 40
柳田国男的氏神信仰论与文化重层论	孙 敏 47
《日本国志》所载日本婚俗词汇浅探	贾 莉 54
中日“天女”之比较	
——以《董永变文》与《竹取物语》为例	向羿仲 61
第二篇 文本·文学研究	69
从《半泽直树》看日本文化	魏丽华 71
入世、战斗的狂人与厌世、绝望的狂人	
——鲁迅《狂人日记》与芥川龙之介《河童》之比较	王 雪 79
于纠结中寓生路	
——武者小路实笃《天真的人》中“自我书写”的特点及意义	周砚舒 86
日本与西欧宫廷爱情文学中的恋爱观	
——以《源氏物语》与《克莱芙王妃》为研究对象	杨 芳 95

率真、逼真与艺术至上

——浅析志贺直哉的文学思想对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影响	宫琳	101
--------------------------	----	-----

第三篇 翻译研究 111

汉语词汇的日译选词与语境		
——以《三国演义》多种日译本为文本	刘齐文	113
《三国演义》多种日译本的翻译比较研究	刘齐文	121
汉语词汇日译的翻译策略及文化意蕴		
——以《三国演义》多种日译本为对象	刘齐文	132
话语语言学视角的中日同形词置换策略		
——以井波律子《三国演义》日译本为文本	刘齐文	142
新兴“被XX”的日译探讨	武锐	151

第四篇 论 考 157

浅析现代日语语料库及其使用技巧	张威	刘 磊	159
晚清时期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		王晓梅	170
对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形成过程的考察	池建新	许蓓蓓	178
文史互动与日本文学教育的关系	汪徐莹	王 芳	189
日本生态文学及价值趋向分析		佟 珊	197

01

第一篇

| 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

甲午战争与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论”的建构

刘金才

一、导 言

100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既是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肇始，也是日本谋求东亚霸主地位而付诸行动的开端，其影响不仅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大举侵华的经济与思想基础，而且成为二战后日本右倾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思想源头。因为，当时日本为了取得侵华战争的胜利和实现其“东亚霸主之梦”，不仅在军事和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霸道侵略手段，而且在文化上进行了“侵华正当论”的思想理论建构，酿造了“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盟主”的意识形态舆论。例如，主张“脱亚入欧”的文明论者福泽谕吉，把“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定性为文明的日本对野蛮清朝的“文野之战”和“文明的义战”，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再如，国民主义论的代表人物陆羯南，原本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但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立即改弦声张“文明胜战”论，将侵华日军称为“征蛮之王师”，把清朝视为“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称“王师的最大目的是旨在谋求东洋之进步而对中国之野蛮进行征服”；还如，以倡导自由、平等、和平主义而登上中央论坛的“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也把对清朝开战视为“是对世界上顽固主义的一大打击”，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为让野蛮的社会沐浴文明之恩光”，是作为“文明的向导”“光明的使者”对顽固野蛮的清朝进行“教化”。因此，他在当时不断鼓吹对清朝开战的“大义名分”和“正当性”。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在大量吸收西方文明和进行近代化国家建构中对往日之师的中国文化价值进行了诸多扬弃，也逐渐摆脱了以往对中国的敬畏，但在当时的国民道德教育中，就如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的《教学大旨》和《教育敕语》那样，均融入了诸如“明仁义忠孝”“明君臣父子之大义”“崇尚诚实

品行”“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等儒家的伦理精神。这些儒家思想，被日本学者视为日本“国体之精华”。难道拥有如此“精华”的文明中国，因为日本要对其开战就即刻变成了“顽固野蛮”之国了吗？这显然于理不通。尽管甲午战争的胜利和大获暴利使日本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也似乎一夜之间改变了日本人的中国观，但是以内藤湖南（1866—1934）为代表的深谙东亚历史文化的日本汉学家们深知，要让世人认知日本对华开战的“大义名分”，认同“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新盟主”的“正当性”，仅靠福泽谕吉等人基于“脱亚入欧”的“文明侵略论”和肆意贬华的日本狂热民族主义是很难做到的。可以说，只有基于文化主义立场，通过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和理论重构，认识到“中国的存亡是坤舆的一大问题”，洞彻“文明大势的移动方向”，才可能达成上述目的。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就是以甲午战争的爆发为契机，应日本“侵华正当论”和“东亚霸主梦”的民族扩张主义之要求，从“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而建构的。因此，要讨论甲午战争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论”的建构起因、理论内容和政治指向，以及它对后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乃至“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作用进行考察和分析。

二、“日本天职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观”

所谓“文化中心移动论”，其核心观点是“坤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中心均是与时移动的，东亚的文化中心已移位到日本”。这一观念和学说，在迄今学界的论述中，多以为是在“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的基础上建构的，而实际的顺序却恰好相反。在内藤湖南的著述谱系中，是首先有“文化中心移动论”，而后才出现为其找理论根据的“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内藤“文化中心移动论”的产生，其实是导源于他为对清战争张目的“日本之天职论”。甲午丰岛海战之后，日本和清政府正式宣战，但战争局势尚不明朗，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也产生了“和好论”与“征服论”等不同呼声。在这种形势下，内藤湖南于1894年8月25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了《所谓日本的天职》一文，先后否定了“和好论”与“征服论”，从天职论的角度论述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他说：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是以西方文明为媒介传给中国，再弘扬推广于整个东方；也不是保持中国陈旧的东西而后再传给西方，而是让我们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行天下，光被坤舆。我们在东方立国，而东方诸国中，

以中国为大，所以要成就这一事业，就必须以中国为主。

由此可见，内藤试图把这场战争定性为一种进行“文明传播”的事业，将对清战争美化成为履行“让日本文明光被坤舆”的“天职”。然而，这虽然回避了征服论和殖民论的侵略意味，但作为汉学家的内藤非常清楚，两千年来日本都处在中国文明的光被之下，其“传播文明”的资格又从何而来呢？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内藤更加确信“拯救东方是日本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并力图从理论上证明这种使命的天赋性。为此，他又于1894年11月12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题为《地势臆说》的社论，正式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论”。

关于“文化中心移动论”，内藤湖南在《地势臆说》中首先论述了地势与人文的因果关系，随后借用赵翼的《长安地气说》、顾祖禹的《燕京论》、章潢的《南北强弱论》等明清历史地理学家关于地气盛衰和人文兴替的论说，以“地势论”为基础建构了其“文化中心移动论”的雏形。其基本内容为：中国的地势发于冀豫两州之间，进而从洛阳移至长安，再移至北京，同时东北的地气也十分旺盛，而人文中心则移至江南。尽管政权在北方不断更替交叠，而文化中心却一直在江南地区，当下地势则在岭南，进而成为文化中心所在地。内藤在其论述的最后指出，“中国的存亡是坤舆的一大问题”，因而需尝试在地势论中“思考文明大势的移动方向”，即提出了“这个文化中心今后将移向何方”的问题。

继《地势臆说》发表一周之后，内藤又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题为《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的社论，开篇即说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世界文明相继而起，“当时它们最有力量宣扬人道与文明，因此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们都为尽其责而出力。文明的中心之所以与时移动，其因即在于此。今又将大移，识者实知此间肯綮，日本将承其大命”。他暗示了文明的中心最终将由中国转移到日本。他在文章中进而论述道：“在文明中心移位之际，后之中心必于前之中心有所承继，有所损益，前者之特色或失，故代之以后者之新特色。”因而，他要求“连接前后两个文明之中心之人，即学术之士，更须稽古揆今，以创造新思想”，提倡“其在野学者，早赴亚细亚大陆探险，收集学术新资料，于学理之上，亦有勇于发奋创立新说者”。如此，日本将“成就东方之新极致，以代欧洲而兴，成为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

由此，内藤不仅将“日本天职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紧密连接在了一起，而且将日本文明的兴起与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结合了起来。但内藤的真意